

知識份子書寫的傳播學轉向

● 唐小兵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傳播理論家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 認為：

我們這樣的文化，長期習慣於將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們說，在事物運轉的實際過程中，媒介即是訊息，我們難免會感到有點

吃驚。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33。）

「媒介即訊息」的觀念對於從傳播媒介的角度重構晚清歷史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從傳播媒介的主體（主要是知識份子）、傳播的受眾、傳播的工具（機構）和傳播的內容（文化形式）等層面切入對晚清歷史的書寫和重現。

李仁淵新近出版的《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以下簡稱《晚清傳播媒體》，凡引此書，只註頁碼）試圖彌合媒介史研究與知識份子研究之間的深刻裂痕，將晚清知識份子放置在當時新出現的報刊出版等傳播機制架構起來的社會空間裏，來考察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的各種傳播形式對晚清中國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和效果，以及在晚清的

李仁淵的《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各種傳播形式對晚清中國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和效果，以及在晚清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的變遷中發揮了怎樣的功用。在作者看來，晚清這一時段「在技術上有鉛印的西方技術的引進、在社會關係上媒體與各階層的關係都有所變動、在文化形式上，晚清傳播媒體展現的語言與意義結構與以往相比有強烈的意義」。

1895年之前，以宗教性和商業性為主要特徵的傳播媒介，影響力局限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而且參與其中的士人處於邊緣位置。甲午戰爭以後，士紳階層認識到西方的強盛不僅僅是軍事、器物的優勢，而是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進，因此必須通過傳播媒介鼓動變法圖強，開始主動利用這個現代的工具體系，撼動了原有的政治與社會階序。

社會、政治和思想的變遷中發揮了怎樣的功用。作者的關切之所以聚焦在晚清(1895-1912)，是因為在他看來，這一時段「在技術上有鉛印的西方技術的引進、在社會關係上媒體與各階層的關係都有所變動、在文化形式上，晚清傳播媒體展現的語言與意義結構與以往相比有強烈的意義」(頁15)。

在這樣一個基本預設下，《晚清傳播媒體》展開了其對傳播媒介在晚清歷史的生長與擴張過程的書寫。1895年之前，作為「現代性的標誌」的新式傳播媒介，最初是通過大量的教會報刊引入到中國，但在這個時期，以宗教性(如教會報刊)和商業性為主要特徵(如《申報》)的傳播媒介，影響力局限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尤其是對於官方權威與科舉士紳主導的地方社會幾乎沒有能夠「撼動」，而之所以導致士紳「普遍缺席」的狀況，是因為：

[新式媒介]不僅須順應中國的狀況作調整，更要面對中國國內原有的龐大複雜社會結構與深厚固結之文化思想資源，使得這些新式傳播工具的影響力受到限制。尤其對於社會結構之中堅、思想資源之主要支持者的中國士人，雖然因為各種理想或實際的原因於此些媒體有所接觸，甚至加入其中，然總體而言，這些士人相對在整體中處於較邊緣的位置，他們對於此新管道的利用也相形被動，並未對此群體產生結構性的改變。(頁94)

到了甲午中日戰爭(1895年)以後，士紳階層對傳播媒介的態度逆

轉，從此前的疏離、觀望甚至不屑(例如知識份子辦報被左宗棠批評為「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到全面的擁抱，中國知識群體開始主動利用這個現代的工具體系，撼動了原有的政治與社會階序。《晚清傳播媒體》認為傳播媒介的功用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1895年以後的政治化」。也就是中日戰爭的失利和屈辱徹底震動了士紳階層，讓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強盛不僅僅是軍事、器物的優勢，而是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進，因此必須通過傳播媒介鼓動變法圖強。從康有為的《萬國公報》到黃遵憲、梁啟超、汪康年等主辦的《時務報》，這個時期的傳播媒介的軌跡非常明確，就是通過報刊政論和宣傳變法左右士紳階層的价值取向，最後推動官僚階層與皇權一起走向政治改革的道路。李仁淵分析了大量當時士紳階層的私人書信、日記和言論，指出：

此時傳播媒體代表的是中下官員與士大夫的改革呼聲，它的本意希望可以喚起具有決策能力的上位者採行革新的方向，並無顛覆原有政治結構的本意，甚至需要既有政治勢力的奧援(如所謂「帝黨」與皇帝)。傳播媒體是溝通內外(中國與西方)、上下(中央核心官員與地方下層官員士大夫)的媒介，但並不存在以外或下取代內與上的意圖。(頁119)

自然，作者並沒有將這個時期政治化的傳播媒介「想像」成理想的「公共空間」，而由於辦報人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和現實考量，所以

在對待政治言論方面的態度就並不全然一致，以《時務報》為例，《晚清傳播媒體》通過汪康年的書札、孫寶瑄、梁啟超書信的精細分析，就充分勾勒了梁啟超與汪康年賦予《時務報》的不同使命和運作方法，因此而造成種種衝突並最後導致汪另立山頭的狀況，而梁啟超則抨擊汪康年「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詠、挖苦南海先生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於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畫。然而弟猶靦然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頁37）。即此可見隔閡之深、衝突之烈。

自然，晚清中國公共領域在與歐洲橫向類比時確實呈現出獨特的「中國映像」，但若放置在它自身成型的歷史中自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至少其空間的位移就表現得非常明顯。正因為這樣一種考慮，作者花了很多筆墨敘述傳播媒介（包括報刊、出版社、閱報處、讀書會等）是怎樣從海外到國內、從租界到內地遷移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傳播媒介的社會功用逐漸發生變化，而知識份子利用報刊進行政治批判時的「概念工具、思想資源和知識倉庫」也慢慢發生了置換。作者在描述了傳播媒介從租界到內地的擴散過程後，指出了其政治化之後的「啟蒙轉向」：

如果說戊戌時期的刊物主要在連結士紳階層之意見、提供士紳言論之園地，以為官方與士紳溝通之橋梁的話，1900年代以來的報刊顯然出現了新方向。這些啟蒙報刊政治意圖差異很大，許多報刊的重點根本

不是政治，但它們的共同點是一致鼓吹破除迷信、陋俗，暗示地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並且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國家，以擺脫當前民族困境。為了要達成後者，所以要鼓吹前者，唯有每一個「國民」都有足夠智識、發揮理性精神，並且體認自身與大群之間的關係，民族國家方能陶鑄而成。（頁252）

作者的這種研究方法自然與新社會文化史在台灣史學界的興盛有密切關聯，有論者認為：

新社會文化史的興起改變了我們過去只研究經驗的和實體的社會歷史，那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簡單對應和決定關係，轉而強調對象徵層面的「表象」的歷史研究，關注話語生產和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化對社會的生產和創造的能動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以後現代主義作為自己理論基礎的新社會文化史在轉換研究視角，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確是歷史學研究領域中的一種「反轉」和一場「顛覆性」的革命。（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頁8-9。）

《晚清傳播媒體》的問題意識（即傳播媒介與政治、社會、思想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完成）正好契合了所謂「話語生產」和「社會實踐」的關係，對晚清的「思想資源」、「公共領域」以及通過理論跨語際實踐形成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分析，都是借助

《晚清傳播媒體》對晚清的「思想資源」、「公共領域」以及通過理論跨語際實踐形成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分析，都是借助對傳播媒介這一話語生產機制的考究來達成。作者深切關注當時士紳階層面對媒介這一新穎的「社會機制」時，心理上是如何因應的。他依據山西「守舊」士人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和江浙士子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所記述的情事，活靈活現地再現了其時其景。

作者的核心問題是考察傳播媒介與社會、政治、思想的互動，那麼傳播媒介的出現到底是使知識份子邊緣化的表徵還是其「中心化」的標誌？作者對此沒有更深入論說。但按其所述，1895年前因為士紳沒有大量參與傳播媒介，導致其社會影響力微薄，而1895年後就完全改觀，似乎是說明了知識份子並沒有邊緣化。

對傳播媒介這一話語生產機制的考究來達成。當然，如果作者僅僅是注重「歷史的表象」，最終雖可能建造一個「精巧的架構」，卻可能在關注豐富的表象的時候，遺漏了歷史人物的「內在心靈」。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作者在仔細爬梳傳播媒介與社會政治的互動的同時，也深切關注當時士紳階層面對媒介這一新穎的「社會機制」時，心理上是如何因應的。他依據山西「守舊」士人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和江浙士子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所記述的情事，活靈活現地再現了其時其景。劉大鵬身處內地的山西太谷地區，也能夠時常通過《晉報》、《中華報》等了解最新資訊，可是他仍舊固執地迷戀舊時代的典章文物，對新式學堂、報刊採取疏離乃至鄙視的態度。《晚清傳播媒體》很好地拿捏到了劉的內心困頓：

對在中西學競爭之下居於劣勢的劉大鵬，始終無法接受西學，及以西學為楚的取材方式，對於革命黨與學生之不滿，更混雜着賴以定位立足的倫理與政治、家庭與國家秩序崩壞之焦慮感。在這種從社會與思想環境塑造而成的心態之下，即使具備新學與革命思想的書刊文本與傳播管道，作為行動者的讀者亦可選擇不去閱讀他。（頁192）

與劉大鵬比較起來，生於沿海仕宦之家的孫寶瑄則要開放得多，他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就廣泛閱讀《國聞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京報》等，以開放積極的心態接受新式媒介與知識。由此可

見，士紳階層因為出身、閱歷、知識結構和地域文化等多種因素，在面對晚清的新式媒介時的態度並不是同質化的，而是呈現出多種多樣的複雜面相。這種對歷史中人物心靈細節的白描，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晚清傳播媒體》理論結構的生硬，而使得歷史書寫環繞着知識份子在媒介與社會的夾層中如何呈現其特有的中國式性格而展開。

知識份子群體的歷史角色與社會空間是作者關懷所繫的重點，有關新式傳播媒體的論述都是圍繞其展開的。1991年8月，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二十一世紀》提出了「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這一重大命題，王汎森與羅志田分別從思想社會史、歷史社會學等不同向度對這個判斷作了細緻分析，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種觀點是張灝提出來的，他認為科舉制和皇權官僚體系的崩解，從表面看似切斷了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力的通道，其實是徹底解放了知識份子，使其可以憑藉現代媒介、出版機構、大學爆發出更大的社會能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份子的輝煌成就便是明證。這似乎是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社會功能「兩極化」的判斷。如前所述，作者的核心問題是考察傳播媒介與社會、政治、思想的互動，那麼傳播媒介的出現到底是使知識份子邊緣化的表徵還是其「中心化」的標誌？作者對此沒有更深入論說。但按其所述，1895年前因為士紳沒有大量參與傳播媒介，導致其社會影響力微薄，而1895年後就完全改觀，似乎是說明了知識份子並沒有邊緣化。

其次，作者旗幟鮮明地反對將西方理論濫用於中國史學研究，卻仍然在該書的某些細部流露出「生硬」的痕迹。例如，在對公共領域的探討中，作者以一個現代知識份子對自由、平等等觀念的體認來慨嘆晚清知識份子對其的冷淡和誤用。這就不是在歷史自身固有的脈絡中來理解歷史人物的作為了。如何在中國自身傳統的脈絡裏來理解晚清知識份子對啟蒙運動的觀念的「解讀」，尤其是如何在中國士大夫強大的清議傳統裏來理解新式傳播媒體對政論、言論的重視，以及知識份子在接受與傳播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接榫作用，也許是該書須要更進一步探討的地方。如同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對嚴復翻譯行為的闡釋一樣，「誤讀」與「曲解」在某種意義上反而彰顯中國文化自身的創造活力與對話能力。台灣學者潘光哲近年來所着力的「晚清士人閱讀史研究」，可說為作者在這方面的進一步深挖和探究開啟了一個可能的路徑，如潘氏發表於《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的〈《時務報》和它的讀者〉就是閱讀史研究的典範。

作者對於晚清報刊做了一個全景式的形式分類和功能界定：宗教性報刊——輸入形式；商業報刊——調適與擴散；政治性報刊——聯絡士紳；社會性報刊——啟蒙開化。這種分類自然有利於歷史分析的方便，但在追求「歷史的簡潔與清晰」的時候，也可能忽略歷史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例如早期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雖然是宗教性報刊，但其實

也介紹許多現代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在某種意義上也扮演了啟蒙者角色。《晚清傳播媒體》在論述社會性報刊的啟蒙功能時，認為這種報刊的主體是地方士紳，地方士紳傳播的新知主要是來自居於中心城市的政治性報刊，那麼這些士紳如何在一個中心向邊緣擴散的社會網絡裏，自覺地保持一種「非政治化」的啟蒙者的社會角色，他們與中心城市鼓吹政治與革命的知識份子的疏離感是如何獲取和表達的，這也許需要作者進一步的辨析。

再次，我們可以感覺到作者的論述是試圖勾連其晚清新式傳播媒體的擴展史與閱讀史，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賈奇 (Joan Judge)：《出版與政治：〈時報〉和中國晚清改革文化》(*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中所出現的問題，即僅僅局限於報紙的言論空間來探討出版與政治的互文關係，成功地把媒介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和公共空間來看知識份子、思想觀念與政治架構、地方社會等的互動，但是正如我們在閱讀時所感受到的，作者在將歷史脈絡化的同時（也就是試圖將歷史的突變通過某種解釋「合乎邏輯性」地串聯起來），卻可能犯了過度重視「歷史的斷裂點」的延續功能。例如作者在分析1895年前後傳播媒介的社會影響力時，就認為甲午戰爭導致傳播媒介的政治化從而擴大其社會參與感。傳播媒介的自身是不是有一個內在的脈絡在向政治化的路徑發展呢？按照當時新式媒介的發展，士紳階層可能並不一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在1895年前一直

作者對晚清報刊做了一個全景式的形式分類和功能界定：宗教性報刊——輸入形式；商業報刊——調適與擴散；政治性報刊——聯絡士紳；社會性報刊——啟蒙開化。這種分類可能忽略歷史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例如早期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雖然是宗教性報刊，但也介紹許多現代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扮演了某種啟蒙者角色。

在疏離甚或抵制，也許另有一條線索在慢慢靠攏新式媒介。如果為了解釋歷史突變的便利，而將1895年的重大事件作為一個截然的分水嶺，可能會遮蔽了歷史內在的混雜性，而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近些年史學界一直在反思的「衝擊—回應」模式。假設作者這樣一種解釋有其科學性，那麼按照作者的邏輯，對

於晚清新式傳播媒介在1900年後的轉向，即從專注政治改革的上層路線轉向到以啟蒙中下層社會為主要目的，該如何解釋？如果前面的衝擊—回應模式是成立的話，那麼這個時間似乎應該倒推到1898年百日維新的挫敗。因此，這種以重大事件來解釋歷史的突變的方式，也許值得進一步討論。

探索走出中日關係困境的一個方案

● 陳奉林

周永生《通向中日和解共榮的道路》一書指出，90年代以來，兩國圍繞着歷史、釣魚島、靖國神社等問題頻繁發生矛盾對立，特別是2001年上台的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中國的抗議，連續四年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了兩國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和冷卻化。這正是中日關係的癥結所在。



周永生著，鄭青榮譯：《日中和解・共榮への道——關係改善への戰略的提言》（東京：日本僑報社，2005）。

周永生是國內中日關係研究隊伍中活躍的青年學者，近年出版了一部深有影響的著作《經濟外交》。最近又出版《通向中日和解共榮的道路——對改善關係的戰略建議》（《日中和解・共榮への道——關係改善への戰略的提言》，下稱《道路》），凡引此書，只註頁碼）。這部著作出版後立即引起國內外讀者的關注。這是作者對近年中日關係屢陷困境的深入思考，無論在內容、分析模式還是在探尋解決困境的出路上，都給人以厚重清新的感覺，視其為破解目前中日關係困境、推進中日關係進程的著作並非虛飾。

《道路》由三部分組成。可以說，作者是在中日關係進退轉換的里程碑上舉出其大筋大節，解析外